

“四书类”的设立与流变

——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为线索

□张晚霞*

摘要 “四书类”是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始设于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北宋以来,《大学》《中庸》二书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渐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撰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系列著作,标志着我国经学史上“四书”名称的确立和“四书学”体系的形成。随着“四书学”著作的日趋繁盛,基于实际需要,《文渊阁书目》创设了新的图书门类“四书类”,集中著录该类典籍。此后,明清官私目录大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并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重要类目之一。充分体现出古代书目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原则。

关键词 四书类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学

分类号 G257.3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4.015

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四书类”是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从它的创设到普遍设立,不过历经明、清两代,但其内部的分合、变化过程,却相当曲折。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本不并行,《论语》《孟子》二书作为先秦重要儒家文献,西汉初年虽属传记之列,但已倍受重视,“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1]。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传记博士皆罢,仅立“五经”博士。此后直至北宋,《论语》与《孟子》在儒家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有根本差异,也体现在历代目录著作中两书的入部分类上。《论语》在《七略》《汉书·艺文志》中入“六艺略”,在《七录》入“内篇”“经典录”,在《隋书·经籍志》入“经部”;反观《孟子》,在北宋以前的各种目录著作中均被列入“子部”“儒家类”。《大学》与《中庸》分别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和第三十一篇,在明代之前的目录书中,有关独立训释《大学》和《中庸》类的著作,皆入“经部”“礼类”(或“礼乐类”),附于《礼记》之下。南宋以后,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著作大量涌现,基于学术发展的新趋势与图书分类的实际需要,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新设了“四书类”,其后的明清官私目录编纂者纷纷效仿,增设“四书类”,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四书类”最后定型。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了“四书学”的构建,“四书”名称确立

北宋前期,理学先驱者如欧阳修、范仲淹,及开宋代解经风气的“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尊奉孟子,形成了庆历之际的“尊孟”思潮,成为“四书学”的端绪。王安石变法,以经义取士,进一步推动了宋代“四书学”的发展:“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2]

王安石建议以经义取士,首次将《孟子》《论语》《礼记》(中有《大学》《中庸》)与《周礼》一起列为经,使《孟子》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其地位也有了实质

* 通讯作者:张晚霞,ORCID:0000-0002-8949-1891,13625610704@163.com。

性的大幅提升,这一事件,对于士人和社会的影响巨大。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将《孟子》及相关典籍附入“经部”“论语类”。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更是将其与《论语》并称,在“经部”设“语孟类”,序云:“前《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岐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3]自此,《孟子》已成为一部与《论语》同等地位的官方儒家经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又进一步,于“经部”单列“孟子”一类。《大学》《中庸》虽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但正如陈振孙所言:“汉儒辑录前记,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驳而不纯。独《大学》《中庸》为孔氏之正传。然初非专为《礼》作也。”^[4]宋代儒生普遍以《大学》《中庸》为圣人之言之正经,为其作专注。北宋司马光撰有《中庸大学广义》一卷(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卷二),随后程颢、程颐更是大力“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5]理学家的“《大学》学”“《中庸》学”循此而起,后继者纷纷撰写四书研究的著作,成为当时的显学。

不过,“四书学”体系的最后形成却是南宋大儒朱熹的贡献:“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6]朱熹酌取前人注解,增加己注,改变历代学者只重注疏、废弃训释的做法,既注重义理阐发,又不废章句训诂,从理学出发,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实体,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精神目标,倾一生之精力相继撰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著作,并确立了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学体系的先后逻辑顺序:“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7]并将《四书》编成了适合初学者使用的教科书——《四书或问》。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把四书集为一编刻于婺州,“这个宝婺刻本,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8]标志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在“五经学”之外作为独立的“四书学”体系在经学史上的出现与确立。

对儒学理论发展完善的巨大贡献,在儒学传承

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都使得朱熹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儒学宗师,其著作受到历代目录学家的高度重视,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28种朱熹编撰的书,其“四书学”著作按专义单行,分列入“经部”“语孟类”(《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和“礼类”(《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依其例,“礼类”收朱熹《大学章句或问》三卷、《中庸章句或问》三卷,并进一步将“论语”“孟子”各自独立设类。“论语”类收《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各十卷,“孟子”类收《晦庵孟子集注》《或问》各十四卷。到元代修《宋史·艺文志》,“孟子”一类又回归“子部”“儒家类”,朱熹的“四书学”著作仍按各类单列。

不过,《宋史·艺文志》“经解类”首次录入3部名为“四书”的著作:张九成《四书解》六十五卷、沈贵瑶《四书要义》七篇、陈应隆《四书辑语》四十卷。沈贵瑶是朱熹后学,陈应隆生平无考。张九成是二程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中间人物,《四书解》显然是朱熹之前的著作,表明以“四书”之称的著述在《四书集注》之前就已出现,但张氏之书不传,“四书”究属何指难以遽断。因此在我国经学史上,严格意义上的《四书》指的就是朱熹纂辑的《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正如清人周中孚所言:“盖自是始有‘四书’之名,而‘章句’‘集注’亦遂为说《四书》者之所祖,先儒旧解不复能与争席也。”^[9]

2 明代《文渊阁书目》始设“四书类”

“四书”之称因南宋朱熹四书研究著作的刊行而确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取得官学地位,则始于元代。“《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10]

元代仁宗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考试,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以朱熹的《章句》与《集注》为官方教材,《五经》也以朱熹及其门人的注解为准,程朱之书遂成为海内士人应举的必读之书,并直接影响到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柳诒徵指出:“明人之崇心性之学,始于帝王之提倡,及科举之统。盖自宋尊崇《四书》,代有阐释,然于学术尚未能统一也。自元仁宗皇庆中定制,专以宋儒《四书》注及《经》注试士。宋儒之说,始夺汉、唐诸儒之席代之。明以制义试士,亦专主宋儒之书。”^[11]帝王的倡导将“四书学”与

科举考试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明初,永乐皇帝又在宋儒理学基础上,编纂并颁行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使理学获得正统的学术地位。《四书大全》在当时的影响颇大:“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余年尊为取士之者也。……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皮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12]《四书大全》问世,古注疏尽废,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成为不同阶层学子为学应举的教科书,研究者亦唯《四书》为准绳,将汉、唐以来的“五经时代”发展到“四书时代”。

我国历史上,每一时代书目的类目增省,都与该时代文献及其学术变化形成一种共沉浮的关系。宋明理学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发展,从宋、元以来,《四书》、性理类典籍日臻繁盛,数量激增,使得将数量庞大的《四书》研究著作组织起来,设立新的类目势在必行,最早进行尝试的,是明代第一部官方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该书由大学士杨士奇主持编纂,完成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其分类以文渊阁藏书的《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始于“天地玄黄”,终于“寒来暑往”),凡20号,共50橱,38类。每号下包括若干橱,号和橱下按图书内容划分类别,依类登录。如“天”字号共五橱三百二十二号,为“国朝”;“地”字号共四橱五百五十五号,分“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玄”字号一橱一百四十九号,为“礼书”“乐书”“诸经总类”;“黄”字号共三橱四百七十四号,为“四书”“性理”,附“经济”。其中,“四书类”著录有朱熹《四书集注》等55种《四书》合著和70种(《论语》34种、《大学》和《中庸》各8种、《孟子》20种)《四书》专义著作。姚名达评价说:“其分类法虽陋,然能不守四部之成规,实开有明一代之风气。”^[13]《文渊阁书目》虽不脱藏书登记簿之窠臼,多受学者讥评,但它所收多为宋、金、元刻本和抄本,首次录入朱熹《四书集注》7部,应该是3种不同的版本,对考校当时的图书状况颇有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库藏图书典藏的具体形式。更重要的是《文渊阁书目》以官方身份率先出面,打破四部成规,编次简略,将许多原属

于经、史、子、集类目析出,各列专类。在宋明理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增设了“四书”“性理”类目,开创了有明一代图书分类体系变革的先例。也使书目成为检索工具的雏型,对其后的官私目录的编撰影响甚大。

明代私家目录中采用《千字文》标识法的,如叶盛《菉竹堂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范钦《天一阁藏书目》(清初抄本)等,甚至清初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文渊阁书目》分类的影响。尤其是万历年间赵琦美编撰的《脉望馆书目》,总体编排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仍以《千字文》总领各细部,共分31号,约87类,《千字文》不仅是其类号,也是图书的排架号,如:“天”字号经包括“经书总类”“易经”“尚书”“毛诗”;“地”字号经包括“春秋左传”“礼记”“周礼”“仪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孝经”“尔雅”共15类,“经部”既设“四书类”,又增分“四书”各小类,分类尤为细密。《文渊阁书目》之后,明代私家目录分类体系的变革蔚然成风,有循“四部”而增减其类目者,如高儒、徐燊等;有自出心裁新创部类者,如晁瑬、陈第等,均各自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或于经部析出各小类,或与其他大类并行。

2.1 扩展四部分类体系,“经部”“四书”单行各自为类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编成《百川书志》,高氏在类目上扩展了四部分类体系,对旧有的书目类例作了较大调整,并增加了许多新类目。全书大体按“经”“史”“子”“集”分四志,志下细列94门,裁定为二十卷,其中一至三卷为“经志”,下设16个小类,其“经志一”包含了“易”“书”“诗”“礼”“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经总”11个小类,把《大学》《中庸》从“礼”类析出,“四书”各书独立成类,朱熹的“四书学”著作按各类单列,大学(12种)、中庸(6种)、论语(5种)、孟子(4种),“总经类”录有《四书》合著1种。高儒虽身为武官,但对类目的设置有着自己的认识:“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14]姚名达也肯定了这一点:“首增类目至九十三门……自来依‘四部’分类者,未有若斯之详明者也。”^[15]万历十四年(1586年),王圻撰《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第一类为“内府书”,特别说明:“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六月,秘书省乞辟校勘检阅等官,仍行下诸路曹司所部州、县应有印本书籍,解

赴州府,以补四库之阙……时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真德秀,乞进读文公朱熹《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从之。”^[16]其“经部”分“易”“书”“诗”“春秋”“礼记”“论语”“学庸”“孟子”“孝经”“经解”“乐律”“仪注”“小学”13小类,合“大学”“中庸”为“学庸类”,于“论语”“学庸”“孟子”后附《四书》合著,收录“四书”各类著述近150种。与《百川书志》相比,又有所改变。至明末,徐燊纂《徐氏家藏书目》,亦作“学庸”“论语”“孟子”诸类,《四书》合著如《古板四书朱注》等则入“总经类”。

2.2 自创分类体系,设“四书类”与其他各类并行

明嘉靖(1522—1566年)时期,晁瑛(1551年)编制《宝文堂书目》,则摒弃传统的四部法,自创分类体系。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33类,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书”“性理”“史”“子”“四书”“文集”“诗”等12类。晁氏新增了不少二级类目,注重收录实用书籍,“四书类”收录朱熹《四书集注》等四书合编及专义著作共48部。其著录丰富而详尽,以备即类查检。

与高儒一样,同是武人出身的陈第对传统四分法也作了大胆改造。陈第于明万历(1573—1620年)间编成《世善堂书目》,直接在四部外增设了“四书”和“各家”两大类,成为六分法,即“经部”“四书部”“诸子百家部”“史部”“集部”和“各家”6大部,凡63小类。“四书部”下又分5个小类:“大学”(13种,含朱子《大学章句或问三卷》)、“中庸”(11种,含朱子《中庸章句或问三卷》)、“论语”(8种)、“孟子”(6种)、“四书总论”(14种),共著录52种,并作注解:“《四书》总编:可举业用”^[17]。可以看出,陈第着眼于《四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把“四书”从经部的二级类目中分离出来,提升为一级类目,专设“四书部”与“经部”并立,从目录学角度将《四书》抬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反映了《四书》著作在当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的社会现实。

明代雕版印刷趋于鼎盛,公私书目大量出现,私家书目尤为繁多,武人出身的高儒和陈第尚且有书目撰述,文人学士更不必详述。与目录著述增多相伴而生的就是图书分类形式的多样化,但不管怎样,目录著作反映某一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总体面貌与水平的基本功用是不会改变的。明代众多的新目录设“四书类”正是为了著录日益丰富的“四书学”著作,顺应了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新趋向。

3 清代“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固定类目

元明以后,研究《四书》的著作迅速增多,尤其是清代,上起皇帝御撰、敕修,下延至村野塾师高头讲章,《四书》文献汗牛充栋,经典著述也已有相当规模。受科举制度、传统教育和主流社会意识的影响,“四书学”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与社会的重视。完全具备了在“经部”独立设类的条件,“四书类”逐渐发展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固定类目。

受明代图书分类体系的影响,清初许多私藏目录亦根据实际需要对四部法类目进行增减、分合,或创设新类目,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谦益《绉云楼书目》、王闻远《孝慈堂书目》等,尤其是黄虞稷在其父黄居《千顷斋藏书目录》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千顷堂书目》,影响更大。《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专录有明一代著述,无论是帝王将相之作,还是布衣文人的诗文杂记,无不搜罗备至,详加著录,是迄今反映明人著作最全的目录之作,并兼附宋、辽、金、元诸代艺文。全目按“经”“史”“子”“集”四部51类排列,下分43门,收录明人著作总计14000余种,附载宋、辽、金、元四代著作2400余种,使从南宋末以至明代数百年间所有典籍灿然汇于一册。《四库全书总目》表彰说:“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18]与以往书目相比,《千顷堂书目》在类目的分合、增删方面,更为精详,诸如“经部”设“易”“诗”“书”“三礼”“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四书”“小学”12类,既设立“四书类”收录《四书》合著之书(98种),又设“论语”“孟子”,收录《论语》(23种)、《孟子》(8种)单书,而《大学》《中庸》单行者仍属“礼类”(共143种),《四书》各专义及合编著作总计达433种。从学理的角度而言,黄氏的分类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大学》《中庸》两篇只有与《论语》《孟子》相合,才能称为《四书》,不然,它们仅只是《礼记》中的篇目而已。进而言之,《论语》《孟子》也符合这一道理。

《明史·艺文志》源出《千顷堂书目》,开创了史志目录记一代著述及首设“四书类”之例,所不同的是,《明史·艺文志》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被收入“四书类”,共计著录明代四书著作59部七百十二卷。而收历代“四书类”著述最为齐全者,莫过于朱彝尊(1629—1709)的专科目录《经义考》,该书统考历朝经义之目,分26类,创立了一个完整的

经学分类体系。与《千顷堂书目》一样,《经义考》既设“四书类”(334种),又使《论语》(372种)、《孟子》(159种)各为一类,而《大学》《中庸》单行者入“礼类”(共著录400多种),通计《四书》各类著述多达1200余部。朱熹的“四书学”著述既有按单行本分列入各类者,又有以《四书集注》之名入“四书类”者。《经义考》著录了存、佚、阙、未见,传播了大批珍贵经典,反映了历代文献的现状、变化及各个时期学术的发展情况。

历代“四书学”文献汗牛充栋,诸说纷呈,但由于大多属科举用书,或为高头讲章,《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的并不多。《总目》沿用《明史·艺文志》类例,将《大学》《中庸》的相关训释及《论语》《孟子》一起并入“四书类”,主要录入宋、元人的“四书”著述,明、清时的则主要入“存目”。“四书类”下收宋代著录26种,存目7种;元代著录11种,存目2种;明代著录10种,存目38种;清代著录15种,存目53种。于宋、元著录多,存目少,于明、清存目多,著录少。四库馆臣依自己的治学旨趣及其对“宋学”的具体认识,对庞杂的“四书学”著作进行了取舍筛选:

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犴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19]。

首先,馆臣们认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是“各有渊源”的两种学问:“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20]《礼记》之《大学》《中庸》由考证推求义理,属于专论性质的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则以朱子义理为精,属于理学范畴。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大学》《中庸》的意义和训释也是不同的,只有从理学出发,将阐发与注解集中起来的训释,才是真正的《四书》范围内的《大学》《中庸》,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是朱熹通过辑合、训解四书的《章句》《集注》第一次将四者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理论力量是单经无可比拟的。

其次,“四书学”的开创者为朱熹。“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于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释《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故自明以来,科举之学,以朱子为断。然圣贤立训以垂教,非以资后人之辩说,为作语录计也。即朱子《章句》《集注》亦以明圣贤之道,非以资后人之揣摩,为取科第计也。”^[21]《总目》“四书类”后序又作了总结:

《四书》定于朱子《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摩其虚词、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仄,并朱子之《四书》亦仄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22]。

朱熹终生致力于《四书》的纂辑,为的是组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体系,以立训教化,从道德养成的理论层面阐述个人道德思想的完善。元延祐取士,也以阐明程、朱义理为标准。而明永乐中,受《四书大全》的影响,“四书学”著述多为科举应试、盈利而揣摩摹写,无视经义的解经传统及《四书》义理的精妙之处,致使为八股文而作的《四书》讲章泛滥天下,这些讲章内容重复乏味,毫无学术意义,几乎都是庸陋鄙陋、粗制滥造之俗文,故大量的明代“四书学”著述被馆臣所摒弃不录。

另外,清人尊崇“汉学”,重词章训诂与考据,且《四库全书》馆为汉学家之大本营,纪昀本人就是一位考据学家。“先有汉儒之训诂,乃能有宋儒之义理。”^[23]《论语》《孟子》之名物制度考证,皆为学问,经由考证才能得义理,不符合者,一概不取。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四书类”,没有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著录,而是著录作“《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应该是有所指的,表明此书可分可合,分则四书,合即一书。文渊阁四库总题“《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很能说明问题。该书提要云:“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

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24]《总目》的分类原则,为后来的《八千卷楼书目》《郑堂读书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善本书室藏书志》《皕宋楼藏书志》《温州经籍志》等目录著作继承沿用。

直到晚清,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编的《书目答问》,于“经”“史”“子”“集”四部外增加“丛书”一类,成为五大类。其经部“四书类”外又设“论语”“孟子”类,并于“论语”附注:“《论语》《孟子》,北宋以前之名。《四书》,南宋以后之名。若统于《四书》,则无从足十三经之数,故视注解家之分合别列之。”^[25]《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广大童生开出的一部推荐书目单,为读书家之书目,凡清政府列祖列宗颁定的官方教本,统称“正经正注”,为“经部第一”,题注云:“此为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柢。《注疏》本与明监本五经,功令并重。”^[26]凡清代汉学家或汉、宋兼采者,重作整理诠释的古典经解及其校本,则统称“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为“经部第二”,题注:“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27]“四书类”除10部作品入选外,其余大量的宋明“四书学”著述均被剔除掉。然“正经正注”中选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又于“正经正注分刻本”中录入“翻刻宋淳祐大字本《四书集注》二十六卷”和“璜川吴氏仿宋本《四书集注》二十六卷,附考四卷”,并于附注中强调:“注疏乃钦定颁发学官者,宋元注乃沿明通行者,《四书》文必用朱注,《五经》文及经解,古注仍可采用,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经学。”^[28]足以说明,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注解及阐释著述在“经部”取得了稳定的存在权,“四书类”成为“经部”分类中固定的类目。

综上所述,南宋以后,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四书类”文献日益增多,而《四书五经大全》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四书学”也成为朝野上下研习的显学。适合这一变化,传统目录中开始设立“四书类”,并逐渐发展成为“经部”的固定类目。

本文虽属“四书类”文献的个案研究,但窥一斑可知全豹。实际上,自西汉刘歆《七略》创立图书分类以来,直到古典目录学的终结,图书类目的分合增省,都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若合符节。东汉以后,随着道教、佛教的流传,道、佛宗教文献迅速增加,南朝齐王俭《七志》附“佛经”“道经”,梁阮孝绪《七录》外篇则分“佛法录”“仙道录”,开后世著录先河。东

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部族南下中原,先后建立起了许多割据政权,各有史书记载,于是有阮孝绪《七录》所设“纪传录”之“伪史类”,《隋书·经籍志》所设“史部”“霸史类”。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影响深远,明、清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大量产生,《四库全书总目》遂于“史部”列“纪事本末类”,且仅次于“正史”“编年”,而入三甲。扩而言之,现代图书分类依然体现这一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对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学术、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原著陆续翻译出版,介绍、研究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论著层出不穷,在目录分类中设立独立类别也是水到渠成,充分体现出历代目录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的原则。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日益深入透彻,新的学科也会陆续产生,相关文献自然涌现,图书内容及数量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图书分类法的变化,目录学分类体系中类目的相应调整将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赵岐. 孟子章句题辞. 见: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663.
- 2 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学校科举之制(另参见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371-372.
- 3 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直斋书录解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72.
- 4 同3:47.
- 5 脱脱等.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一. 上海:中华书局, 1977: 12710.
- 6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293.
- 7 黎靖德. 朱子语类(卷十四).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49.
- 8 束景南. 朱子大传.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766.
- 9 续修四库全书(第924册)·史部·目录类·郑堂读书记(卷十二经部)·四书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56.
- 10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四书类序.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289.
- 11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 1988: 609.
- 12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301.
- 13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严佐之导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94.
- 14 高儒. 百川书志. 见: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
- 15 同13: 104-105.
- 16 续修四库全书(第765册)·史部·政书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二)·经籍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72.
- 17 陈第. 世善堂藏书目题词. 丛书集成初编本.
- 18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32.
- 19 同10: 289.

- 20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千顷堂书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176.
- 21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四书本义汇参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318—319.
- 22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四书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307.
- 23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四书参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318.
- 24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四书章句集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293.
- 25 范希曾编;瞿凤起校点.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9.
- 26 同25:1.
- 27 同25:8.
- 28 同25:7.
-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淮北,235000
收稿日期:2015年9月30日

The Si Shu Category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In the Description of Zhu Xi's *SI Shu Zhang Ju Ji Zhu* as a Clue

Zhang Wanxia

Abstract: The Si Shu is a category of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appeared later in the Ming Dynasty, began in the official catalog *Wenyuan Pavilion Bibliograph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a Xue* and *Zhong Yong* two books by the Neo-Confucians' attention, gradually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arallel Menciu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y Zhu Xi in *SI Shu Zhang Ju Ji Zhu*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i Shu Xue series of works, marking China's establishment and for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i Shu" the name and of the "Si Shu Xue" system. With the works of the Si Shu Xu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sperous,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Wenyuan Pavilion Bibliography* created a new category of books—the Si Shu Category, centralized cataloging the classics. Since then,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catalogue of Ming Qing Dynasties different degrees was added the Si Shu Category and the related category,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 Shu Category,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y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by the Jingbu.

Keywords: Jingbu; Si Shu Category; 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Si Shu Xue

更正

本刊2016年第3期的目录页,漏印《社会控制论视角的文献控制论述略》一文的第二作者孟越。特此更正,并向两位作者致歉。